

# 主体内面的外化与狂人的内心叙事

——《狂人日记》细读

李培艳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北京 100026)

[摘要]《狂人日记》作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因“主题的深刻”与“格式的特别”,是历来鲁迅研究的重点之一,蕴含着丰富的再阐释空间。小说通过狂人的内心叙事以日记体的自白形式使狂人主体的内面外化,在社会与历史的双重压力之下,其主体意识呈现出被害妄想的精神病肌理,身陷同质性的生命黑暗时间,强大而又脆弱,黑暗无名与清醒理性并存。从主体的存在特性来看,狂人的存在是非历史的、丧失社会关联与时间观的,近于一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精神存在。正是基于这种主体特性,其带来了一个关照中国社会历史与文化的超越性视角,不但使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底层的症结外显,而且呼吁了新文化运动的核心议题——启蒙、立人与社会改造。

[关键词]狂人;被害妄想;主体内面;新文化运动

[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25)03-0032-07

DOI:10.15981/j.cnki.dongyueluncong.2025.03.004

《狂人日记》最初发表于《新青年》杂志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20日),作为中国新文学史上以及鲁迅个人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因日记体小说特有的叙述形式与表意机制、狂人的“发狂”对中国社会与历史的批判力度,历来是鲁迅研究的重点,似乎蕴含着无尽的阐释空间<sup>①</sup>。在近年不断丰富的文本阐释中,围绕《呐喊·自序》所提出的“青春”议题以及《狂人日记》与鲁迅自身生命思想轨迹的隐性关联的研究,打开了一个颇有意思的话题空间。例如,伊藤虎丸在《小说家鲁迅的诞生》一文中将“《狂人日记》作为小说家再生以前鲁迅自身的心灵履历”,认为小说的内在于“青年鲁迅与西欧近代文艺的相遇”,狂人从发狂到治愈的历程同时也是鲁迅告别青春,获得自我的记录,即现实主义作家鲁迅的诞生<sup>②</sup>。其实,早在伊藤虎丸之前,竹内好就认为鲁迅通过《狂人日记》把握住了“某种根柢上的态度”,进而成为一个文学家<sup>③</sup>。这些研究聚焦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十年间鲁迅的沉默与生命黑暗时期,将狂人

[基金项目]本文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启计划”资助(项目编号:2024QQJH192)。

[作者简介]李培艳(1984—),女,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文学部编辑,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以及相关的新青年与新文学话题研究。

①详细参阅:薛毅,钱理群:《〈狂人日记〉细读》,《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11期;陈思和:《现代知识分子觉醒期的呐喊:〈狂人日记〉》,《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李今:《文本·历史与主题——〈狂人日记〉再细读》,《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

②详细参阅[日]伊藤虎丸:《小说家鲁迅的诞生》,载《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李冬木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6-125页;[日]伊藤虎丸:《〈狂人日记〉——“狂人”的治愈记录》,载《鲁迅与终末论 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58-178页。

③详细参阅[日]竹内好:《鲁迅》,孙歌编:《近代的超克》,赵京华、李冬木、孙歌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79页。

的觉醒与失败、鲁迅文学的发生、新文化运动的展开三个层面的问题置于同一问题框架,追溯鲁迅从一个“摩罗诗人”到“现实主义小说家”的转变轨迹,极大地拓展了研究的话题空间与问题深度,为重新认识狂人的主体特性与被害妄想症提供了新的契机,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过度阐释。本文以青年鲁迅的思想生命轨迹为潜在背景,聚焦狂人主体的内面以及其对吃人社会的认知逻辑,通过文本细读分析狂人的主体特性、存在意义以及其对新文化运动的预言与启示。

## 一、围绕狂人形象的争议

《狂人日记》由一段文言小序与十三篇白话日记构成,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了主人公“我”意外觉醒之后,获得超越性的“感知和发现能力”,进而产生被害妄想,发现历史“吃人”的真相,为了反抗自身“被吃”的命运,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世界,但最终在反抗无效与自己也“吃过人”的双重失败中,治愈并赴某地候补的精神历程。狂人的觉醒与发狂、对“吃人”的社会的认知以及由此引发的被害妄想无疑是理解整篇小说的核心线索,历来围绕小说的争议也多集中于对狂人形象的认知。在新启蒙思潮的背景下,通观 1980 年以来的研究,将狂人当成“一个真实的狂人”“一个精神界的战士”“一个患了迫害狂的精神界战士”可谓三种代表性观点<sup>①</sup>。争议的本质在于对狂人所患被害妄想症,或者说启蒙与疾病关系的不同定位。究竟该如何认识狂人身上的疾病色彩,其究竟是一个纯粹的精神疾病患者,还是一个觉醒的启蒙者,甚或一个患病的启蒙者,小说开篇的文言小序其实已经隐含了这种内在争议:

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识。<sup>②</sup>

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对于狂人“发狂”的这段疾病历程的定位,这段文言小序已经蕴含了大哥、“余”及狂人自身三种不同的立场。首先是作为日记的持有者且见证了狂人整个发病历程的大哥,通过其面对旧友的探视时不以为意的“大笑”可知,大哥显然将狂人的“发狂”定位为一种纯粹的精神疾病。其次是“我”即已经痊愈且“赴某地候补”的狂人自身的定位。对于《狂人日记》的题名,据小序记载,“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由此可知,狂人可谓一种自我命名,隐含着“我”回归“正常人的世界”之后对自己这段疾病人生的定位。在小说中,还有一个与狂人相对应的概念——疯子。在中国传统与现代汉语的语义中,二者的含义其实有着很大的不同,狂人并非贬义,多指向行为与众不同、有着独立个性与极致追求的人,通常蕴含着精神层面的异端与反叛色彩,而疯子则指向纯粹的精神疾病,多用于贬义。小说中的狂人对此是有着基本的自觉的,在他看来,疯子的命名是对自身的一种污名化,背后隐含着“正人君子”的阴险手法,只要以疯子的名目罩上自身,便足以使“吃人”合法化。狂人在痊愈之后将病中的文字命名为《狂人日记》,而非《疯子日记》,足见其对自身这段“发狂”的生命历程是有着主体的自觉与自省的。再者是文言小序的添加者“余”的态度。“余”显然具备基本的现代病理学知识,因其对日记“持归阅一过”,便知对方所患为“迫害狂”之类的精神疾病,且明确指出其将日记编辑成篇的目的在于“供医家研究”。因此,“余”虽也将狂人的“发狂”定位为一种疾病,但其态度其实不同于大哥,“余”所秉持的近于一种客观、理性、科学的第三者立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以往

<sup>①</sup>薛毅,钱理群:《〈狂人日记〉细读》,《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11期。

<sup>②</sup>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页。

的研究中通常将小说的文言小序与白话正文的对立解读为传统与现代两个世界的对立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

而且,《狂人日记》虽出自狂人之手,但却是经过“余”的选择与抄录的,或者说“余”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狂人日记》的创作,因为日记本身“语颇错杂无伦次”,没有明显的时间标识,是“余”通过将其中“略具联络者”整理成篇的方式给了日记内在的叙述机理与时间线索,“余”的整理可以说是一次颇具“现代”眼光的整理。因此,“余”的客观理性与狂人的自省里共同蕴含着鲁迅写作《狂人日记》的初衷以及对狂人的定位。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狂人这份未曾言明的自省与自觉,而“余”所秉持的现代精神病学立场有多大程度的解释力?这就需要回到狂人觉醒与发狂的心路历程,结合现代精神病学的知识,在启蒙的特殊语境中,对狂人主体的内面做深层的分析,进而重新审视狂人“内心的现代性”。

## 二、月光、启蒙与脆弱的主体状态

小说没有追溯狂人“发狂”的前史与治愈的历程以及治愈之后的现实人生,日记展示的仅仅只是狂人精神失常的一段历史,或者说是一种生命落入某种黑暗无名的、时间同质的沉没状态。对于狂人觉醒的契机与过程,作者并未言明,仅日记的第一节做了极为简洁的交待: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需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sup>①</sup>

在这部分叙述中,唯一留下狂人觉醒线索的是关于“月光”的描述。“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映射出“我”的觉醒与月光有关,在这里,月光关乎启蒙以及某种超越性的东西,“月光”出现的直接结果是“我”走出了过去三十多年发昏的状态。正如伊藤虎丸所言,因为与“月光”的相遇,在主人公身上,“发生了‘认识主体从作为被赋予的现实(也包括自我本身)当中的隔离’”的情况,进而将自身从过去始终与之一体的旧封建中国社会中拉将出来<sup>②</sup>。作者几乎是以隐喻与象征的方式交待了狂人觉醒的历程,狂人的出现可以说是一个结果,近乎《圣经》中“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的创世叙述。虽然有“月光”这种超越性力量的存在,但在小说的叙述机理中,狂人的觉醒更近于启蒙主体的一次自为行动,既不存在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先后主从的不对等的权力结构,又无需面临康德意义上个人自主启蒙所难以消解的内在悖论<sup>③</sup>。狂人的觉醒并不需要一个已然解放的能够运用自己理智的行动主体为前提,启蒙是一个自为的结果。

而且,觉醒与发狂是同步发生的生命历程,在觉醒的那一刻,同时也意味着发狂的开始,或者说疾病的生成。因启蒙与疾病共生,狂人像是落入了某种黑暗无名的生命处境,在其身上,清醒理性与黑暗无名并存。对于狂人而言,启蒙所带来的并非一种强悍的主体能量,而是怕,是恐惧,是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世界的精神张力与危机,是一种随时随地“须十分小心”的脆弱的主体状态。与狂人虚弱的主体性相对应,整篇小说贯穿着一种压抑、幽闭的黑暗气息,始终“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时有时无的“月光”似乎仅仅只是从黑暗中打开了一条裂缝。这种脆弱的主体状态也正对应了汪晖对《呐喊·自序》与“鲁迅文学的诞生”的分析:“与《破恶声论》的强烈主体气息不同,《呐喊·自序》标志着《呐喊》的诞生正是

<sup>①</sup>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第444页。

<sup>②</sup>伊藤虎丸:《〈狂人日记〉——“狂人”的治愈记录》,《鲁迅与终末论 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第159页。

<sup>③</sup>即运用自己的理智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状态,需要一个已然解放能够运用自己理智的行动主体为前提。详细参阅康德:《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载[美]詹姆斯·施密特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 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徐向东,卢华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1-67页。

主体论破产或解体的产物”，《呐喊》源自某种主体沉没的状态<sup>①</sup>。作为《呐喊》开篇的《狂人日记》可谓这种主体论破产的直接产物。

### 三、狂人的内心叙事与被害妄想症

在对狂人的起源做了简单的交待之后，从日记第二节开始，小说便以狂人的内心与周遭世界对话的方式层层推进地揭示了狂人内心的恐惧及其对“吃人”的社会本质发现的心路历程。“月光”首先唤醒的是狂人对于自身异己处境的自觉，使其身处与周身现实世界强烈的心理冲突与张力中。在狂人的眼中，外部世界是凶险的，无论是赵家的狗、邻居赵贵翁，还是路上偶遇的行人与小孩子以及当街教训儿子的女人，似乎都对其充满敌意，都在以异样的眼色观察“我”、议论“我”，“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街上的人“青面獠牙”，在被管家陈老五拖回家中后，家里的人也一样是陌生的眼色。直到“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对大哥说起“狼子村”的大恶人被大家吃掉心肝时，狂人才从他们和外面的人的人一模一样的眼色中幡然醒悟，原来“那女人‘咬你几口’的话，和一伙青面獠牙人的笑，和前两天佃户的话”，都是准备“吃人”的暗语，进而得出“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的结论。而且，不同于福柯将疯癫与理性对立作为人类的另一种存在形式，狂人虽然“发狂”，但其“疯癫”的背后却是有着理性自觉的。因为，为了弄清楚“吃人”的真相，秉持“凡事总需研究，才会明白”的理性精神，狂人对“吃人”社会的认知并未止于对自身“被吃”命运的自觉，而是由个体经验追溯到了自身所身处的文化传统，进而重新发现了历史：

凡事总需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书上写着这许多字，佃户说了这许多话，却都笑吟吟的睁着怪眼睛看我。

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sup>②</sup>

历史以“仁义道德”为表，以“吃人”为本质，而且，这历史没有年代，始终停滞在“吃人”的野蛮状态。对于狂人这一惊世骇俗的发现，历来已经多有研究。这里想进一步说明的是觉醒与发狂让狂人身处个体与社会的对立之中，而这一新的历史发现使狂人和历史之间同样形成了一种对立关系。因为，作为“现实”的最大佐证，“历史”印证了“我”对自身“被吃”命运的自觉，进而与“现实”共同构成对于“我”的压迫性力量，以至于“书上写着这许多字，佃户说了这许多话，却都笑吟吟的睁着怪眼睛看我”。而且，从现实中“被吃”的恐惧到对几千年历史“吃人”的本质的发现，狂人的自觉从对个体命运的思考上升为对整个民族历史与文化传统的反思，正因为如此，狂人的“发狂”不再只是一个个体事件，而是一个需要做更深层的民族文化解读的历史事件。

正是由于这一惊人的发现，现实世界完全被纳入狂人的“妄想”，遵循个体心理、现实、历史三者互为印证的认知模式，以“吃人”为线索，语言符号世界通过狂人的“妄想”被重构：蒸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吃起来“不知是鱼是人”，给“我”看病的医生是刽子手假扮的，目的“无非借了看脉的名目，揣一揣肥瘠：因这功劳，也分一片肉吃”，连前几天多看“我”两眼的赵家的狗都是已经接洽过的同谋，大家已经联络好，“布满了罗网，逼我自戕”。当然，这期间最大的发现是连大哥也是“合伙吃我的人”，“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在日记层层推进与强化的叙述中，从人到动物、从动物到无生命的物、从路人到亲人全都成了“吃人”的同谋者。而且，历史完全可以印证“我”的心理现实。因为即

<sup>①</sup>汪晖：《鲁迅文学的诞生 读〈呐喊·自序〉》，《声之善恶 鲁迅〈破恶声论〉〈呐喊·自序〉讲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21页。

<sup>②</sup>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第447页。

便医生不是刽子手假扮的,“也仍然是吃人的人”,因为医书上早已写明“人肉可以煎着吃”,而自幼讲书时,大哥就倡导“易子而食”“食肉寝皮”,“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因为狼是“海乙纳”的亲眷,“海乙纳”吃死肉,赵家的狗因其是狼的本家,所以同样是“吃人”的同谋。可以说,以“吃人”为认知基点,日记透过狂人的视角重新建构了整个语言符号世界的意义。

在这部分最具精神病理色彩的描述中,语言与现实脱节,思维与现实分离,遵循狂人的内心叙事逻辑及其对周遭世界暗语的个体化解读,语言的意义被重新创造。“历史”与“我”的心理现实互为印证,从物理性的“吃人”到精神性的“吃人”、从现实社会层面的“吃人”到历史文化传统的“吃人”,狂人的精神世界自成体系,与常人之间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无法沟通的世界,且因其始终身处“被吃”的恐惧,被冠以被害妄想症。

在现代精神病学意义上,被害妄想症是精神疾病中比较常见的一种,通常指患者处于恐惧状态而胡乱推理和判断,思维发生障碍,因坚信自己会受到迫害或伤害,患者往往会变得极度谨慎和处处防备,时常将相关的人与事纳入自己妄想的世界中。单从精神与心理的症状来看,狂人的确带有明显的“被害妄想”的心理特征,几乎是以“妄想”的方式重构了整个语言符号世界的意义与逻辑关联,但其绝非单纯精神病学意义上的被害妄想症患者。因为,狂人的“被害妄想”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与存在危机的表征,我们不能将日记中的“吃人”做实体化理解。作为一篇象征小说,《狂人日记》更像是一个文化寓言/预言,小说中所谈到的“吃人”与“被吃”问题,虽有现实的物质所指,但更多的是一种象征与修辞,即将精神性的问题以形象化的语言(“被吃”)表达出来。狂人的“被害妄想”并不是简单的精神病理问题,而是个体觉醒之后所面临的文化、历史与社会危机的心理表征。

这一点需要回到狂人内在的主体状态来做进一步澄清。小说通篇都是狂人的内心叙事,自发狂的时刻开始,语言超越主体使狂人内心的声音外化,日记体的自白形式使狂人主体的内面以极端的、丧失现实的方式呈现。或者说,对于狂人而言,已经没有主体的内外之分,因丧失现实感,通篇小说所呈现的更像是一个精神失常的界面。因此,我们很容易透过表层的叙事来分析狂人的主体状态。首先,狂人的存在是溢出常人世界、丧失社会关联的。因“月光”的出现使狂人在自身的社会与文化传统中成为异端,精神自成体系,面对密不透风的“吃人”的现实世界,个体与他者、社会的冲突达到极致。其次,狂人的存在又是丧失时间观的。因为由日记“黑色字体不一”来看,这些文字虽“非一时所书”,但通篇小说的叙述时间是同质的,日记只有标识白天和黑夜的月光,小说事件即便压缩在同一天发生,也并不影响叙述效果。再者,狂人的存在是非历史的。因为由个体经验追溯到自身所处的文化与历史传统,通过对历史“停滞”与“吃人”本质的发现,狂人不但“从整体上否定了历史”<sup>①</sup>,而且也使自身陷入了与历史的对立。

因此,从主体的存在特性来看,狂人的存在是非历史的、丧失社会关联的,近于一个与现实世界完全对立的精神界面,因时间同质,同时也像是一个被拉长的“历史瞬间”,其最显著的特性是既无法在周身的现实社会,也无法在自身的文化传统中定义个体的存在。当然,这样同样使狂人成为一个可以重新定义主体与社会、主体与历史关系的全新的时间起点。正因为这一特殊的存在处境,一方面,狂人可以超越集体无意识的制约,发现“吃人”的社会本质,内蕴重新定义主体与历史关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个体与社会、个体与历史的对立,狂人成了无论从现实还是历史层面都无法定义的存在,这也造成了主体的存在危机,使其在觉醒的同时,始终伴随有“被吃”(主体消亡)的心理恐惧。可以说狂人的“被害妄想”是主体所面临的存在危机的必然症候,“启蒙”在唤醒个体超越性的历史视角的同时,也成为主体疾病的根源,狂人的“被害妄想”更像是对中国式启蒙的一种隐喻。这也决定了狂人不是鲁迅在《摩罗

<sup>①</sup>对于狂人把握历史方式的研究可参阅季剑青:《从“历史”中觉醒——〈狂人日记〉主题与形式的再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7期。

诗力说》与东京留学时代所倡导的“超人”与“精神界之战士”，他虽有反抗与改造社会的意愿，但却缺失强悍的主体能量，相反，因“被害妄想”始终身处某种黑暗无明的脆弱状态。

#### 四、狂人的失败与新文化运动的展开

日记的八、九、十则着重叙述了狂人以一己之力反抗“吃人”社会的“义勇和正气”。狂人先是在梦中与青年人展开“吃人”正确与否的辩论，既而试图说服大哥放弃“吃人”。然而，狂人的反抗显然是失败的，其非但没有将“吃人者”唤醒为历史变革的主体，更为悲剧的是重新以“疯子的名目”被关押起来，再次回归不分日夜、门也不开的隔离状态，其间因回忆起“妹子的死”产生自己也“吃过人”的自觉（以往的研究中所定义的狂人的“第二次觉醒”）。正是这一对自身也“吃过人”的终极发现使狂人彻底失去了道德质疑与社会反抗的立场，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世界的精神张力消解，启蒙的危机消亡，疾病被治愈，最终以“赴某地候补”的方式回归社会。

狂人最终被治愈的结局通常被理解为小说叙事的反讽<sup>①</sup>，而日本学者伊藤虎丸的解释则稍有不同，他认为小说的结局意味着狂人最终“超克青春”，从“被害者意识”中解放出来，变回一个普通人，选择在现实社会中扎扎实实地工作，也正因为如此，他将《狂人日记》的发表定位为鲁迅现实主义文学的诞生<sup>②</sup>。狂人的结局颇为值得反思，虽然狂人最终从“被害者意识”中解放了出来，但回归社会绝不意味着他对于青春的“超克”，相反，正是启蒙与青春的失败。因为，作为四维铁板一块的“吃人”的黑暗世界的唯一觉醒者，在整个社会缺少革新动力与大的社会结构性变革、觉醒的个体没有得以存活的社会空间的处境下，狂人所可能面临的命运有三种：第一，正如小说的结局，因对自身的绝望疾病被治愈，完成从反抗者到共谋者身份的转变，以精神性的死亡与反抗能动性的消亡为代价，走出发狂与被隔离的状态，重新成为旧秩序的一员；第二，遂了“正人君子们”的愿望，为了避免“被吃”的命运而主动“自戕”，以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死亡为结局；第三，如现代精神病院对于精神病人的隔离治疗，被“正人君子们”罩上“疯子”的名目，永远像鸡鸭一样被关起来，始终存活于不分日夜、黑暗无名的同质时间，主体停滞于清醒与发狂并生的状态，“历史瞬间”被无限延长，直至肉体的死亡。实际上，这三种可能的命运并无本质的区别，无论是永久被隔离，还是自戕，甚或以精神张力的消解为代价回归旧秩序，不过是“被吃”（主体消亡）的不同形态。可以说狂人的失败是一种必然，探讨其做“候补”之后的主体状态不具备问题的生产性。狂人真正的存在意义在于其作为一个超越性的“历史瞬间”对中国社会与历史的批判与反思意义。

以小说叙事的反讽结构为基础，从表层来看，狂人的被治愈意味着其没有能力突破“吃人”的社会，分裂的世界重新被整合，疾病时间被抹去，对抗与冲突的张力消亡。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狂人从一开始就预言了新文化运动的失败。但狂人的出现确有其特殊意义，因为其存在提供了一个观照中国社会文化与历史的独特的精神界面。首先，狂人以超越性的视角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精神界面，以“疾病”的方式呈现了文化、历史与社会的横切面，照见历史的真相，清晰地呈现了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其次，狂人虽然失败了，但狂人的出现重新定义了自我与他者、自我与社会的关系，站在现代主体生成的立场上，这是一次具有历史坐标意义的主体觉醒。再者，狂人虽然没有能够超越“吃人”的社会，但他已经不同于那些纯粹“吃人”的人，狂人的出现意味着“吃人”的世界曾被超越，世界被区分为“吃人”的世界与对“吃人”自觉的世界，狂人虽然无法成为政治上的能动者，但却指明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即将民众唤醒为历史变革的主体。

<sup>①</sup>薛毅，钱理群：《〈狂人日记〉细读》，《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11期。

<sup>②</sup>[日]伊藤虎丸：《小说家鲁迅的诞生》，《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第86-125页。

而且,狂人的存在危机与失败呼吁了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重要议题——五四时期的社会改造问题。狂人所面临的危机并非一场纯粹精神意义上的存在危机,更是一场社会、历史与文化危机,需要更为根本意义上的结构性社会变革来解决。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谈到《狂人日记》的写作缘起时曾提出著名的“铁屋中的呐喊”。狂人无疑正是四维都是黑暗的铁屋中的最初惊醒者,即没有从昏睡入死灰、终将承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的少数人,而《狂人日记》的写作则基于一种对于绝望与希望辩难之后的“希望在于将来”的根本性态度。因为既然清醒便有毁坏铁屋的希望,清醒的“死”总好过昏睡的“死”。也正因为如此,鲁迅在《阿Q正传》中让愚昧狭隘、自欺欺人、自轻自贱的阿Q在临刑前的恐惧中,第一次获得真正的主体觉醒<sup>①</sup>。然而,无论对于狂人,还是阿Q,获得真正的主体性只是第一步,同时更需要的是“毁坏这铁屋”的社会变革。也就是说,在更为宽泛的思想与文化启蒙意义上,在启蒙与立人之外,新文化运动还需要塑造新的社会,创造足以容纳觉醒个体的新的社会空间。正是基于此,五四那代人所主张的是脱离原有的社会的“再造新屋”式的社会重建主张,这也正是新文化运动初期无政府主义社会改造思潮在当时的思想界流行的根源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狂人的失败呼吁了新文化运动的内在主题,即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需要的不仅是思想启蒙与文化秩序的变革,同时也是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革。

## 小 结

以“月光”与狂人的觉醒为起点,小说《狂人日记》以日记体的自白形式呈现了狂人发狂的精神历程,提供了一个能够照见中国社会与历史真相的横切面。一方面,狂人超越了集体无意识的制约,发现了“吃人”的社会本质,蕴含着重新定义主体与历史关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个体与社会、个体与历史的极端对立使狂人成了无论从现实还是历史层面都无法定义的存在,因而身陷被害妄想,这使狂人的主体状态呈现出既强悍又脆弱的主体特性。启蒙在唤醒超越性历史视角的同时,也成为主体疾病的根源,可以说“狂人”的发狂是启蒙理性在中国文化与社会中的特有形态。从表层来看,狂人最终没有能够突破“吃人”的社会,其从一开始就预言了新文化运动的失败,但狂人的出现确有其特殊意义,其不仅提供了一个观照中国社会现实与历史文化的独特的精神界面,而且在启蒙与立人之外呼吁了新文化运动的另一核心议题——五四社会改造问题。“狂人”的出现本身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一种“呐喊”与“希望”,特别是小说结尾“救救孩子”的启蒙呼唤从内在改变了小说叙事的肌理,打破了黑暗的历史闭环。狂人虽然失败,但由后续的历史来看,革命以更为激烈的方式打破了铁屋与吃人的社会,因为将民众唤醒为历史变革的主体是后续中国革命持续的历史主题。

[责任编辑:曹振华]

<sup>①</sup>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详细参阅[日]伊藤虎丸:《鲁迅的小说及其人物形象》,载《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第141-142页;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1-66页。